

古典文史基本知识丛书

诸子与理学

蒋伯潜
蒋祖怡



诸子与理学

蒋伯潜 蒋祖怡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力励

* 古典文史基本知识丛书 *

诸子与理学

蒋伯潜 蒋祖怡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曙光印刷厂排版 亭林印刷厂印订	1997 年 5 月第一版 199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60 千 印数: 0001-5000
ISBN 7-80622-221-9/B·3	定价: 12.00 元

前 言

我国的传统文化，其包容的内含可以很广，凡过去存在过的事物，衣食住行，几乎无不可纳入文化这个范围。但传统文化就其最基本的典籍来说，集中在经、史、子、集四大部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十三经（或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诸子百家以及诗词、歌赋、散文等几大方面，这些可统称之为传统文化的“经典”。作为一个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中国人，有必要也有义务尽可能多地阅读学习一些文化经典著作，以了解、通晓传统文化的源流嬗变，这样才能进一步谈继承与发扬的问题。所以，经典著作的通俗化、普及化工作，便显得十分重要。

“五四”以来，有许多著名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像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顾颉刚的《尚书》翻译和《汉代学术史略》、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范文澜的《经学概论》，还有他的一些关于经学的讲演录和《文心雕龙注》等，都是杰出的成绩。这些学者中影响更为广泛的，则是朱自清、周予同和蒋伯潜。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周予同注释的《经学历史》和蒋伯潜的《十三经概论》，都已成为学习传统文化经典的必不可少入门书。这三部书，解放后分别由三联、中华和上

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出版，并多次加印，传播很广。但后二部书专谈经学，前一部书叙述虽很全面，却稍见简略。现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决定重印蒋伯潜、蒋祖怡父子合著的原世界书局于1942年出版的“国文自学辅导丛书”中的六个分册，正可弥补这一缺陷，适应当前读者的需要，我以为这对于传统文化的普及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这六本书分别是《经与经学》、《诸子与理学》、《骈文与散文》、《诗》、《词曲》、《小说与戏剧》。据我看来，这六本书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文字通俗，深入浅出。作者把艰深复杂的内容，讲得条理清晰，明白易懂，读者很容易接受。

第二，打破旧观念，建立新思想。如把不在经典之列的小说与戏剧提升到经典的位置用专册论述介绍，对白话文学也给以应有的重视等等。

第三，立论公允，不偏不倚。对学术上的今古文、汉学宋学等学派门户之争，不任意偏袒或贬低，据实论述，读者可据此得到完整的概念，并作出自己的判断。

第四，结合实际，具体实用。作者有数十年自中学至大学的教学经验，懂得学生的不同程度和具体要求，使本书的讲解切合读者的实用（如讲诗词则详述格律、音韵）。

第五，古今中外，贯穿配合。本书的论述讲解，不仅讲古，也贯穿至今；不仅讲中国的，还配合讲外国的。正如作者自序所说，本书“以文学与学术为经、文学史与学术史为纬，而文学概论、文学批评、群经诸子及理学之内容流变皆融合于其中”，可使读者对于传统文化及其渊源流变，获得切实明白的知识。

正因为如此，我以为这六本书不仅对于想在这些内容方

面有所了解的读者有帮助,而且对于普及读物的写作,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范例。当然,这套书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缺少关于史书、史学及其他文史专门知识的讲解与叙述,读者可用别的书(如《中国历史研究法》、《经典常谈》等)来补充。好在本书各个分册相对独立,与整体无妨。

本书作者蒋伯潜(1892-1956),浙江富阳人。早年从钱玄同、马幼渔为师,又曾问学章太炎、梁启超门下,深研经学。三十年代末,任教于上海大夏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兼任世界书局特约编审。抗战胜利后曾出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解放后任浙江图书馆研究部主任,并多次被选为省、市人大代表。蒋祖怡(1913-1992),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8年受聘于浙江大学文学院。解放后任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系副主任,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与教学。这套书的出版,也是对这二位前辈学者的纪念。

钱伯城

1996年12月,于上海

目 录

第一章 诸子勃兴的因缘·····	1
第二章 诸子的派别 ·····	11
第三章 各派的价值及其关系 ·····	20
第四章 儒家一——孔子 ·····	27
第五章 儒家二——孟子 ·····	39
第六章 儒家三——荀子 ·····	49
第七章 道家一——老子 ·····	60
第八章 道家二——庄子 ·····	70
第九章 墨家 ·····	80
第十章 法家 ·····	91
第十一章 所谓“名家”一——儒道法墨的名学 ·····	102
第十二章 所谓“名家”二——惠施公孙龙及“墨辩” ·····	111
第十三章 阴阳纵横杂农小说五家 ·····	123
第十四章 秦汉诸子 ·····	132
第十五章 诸子学衰落的原因 ·····	142
第十六章 诸子学的余波——魏晋思想 ·····	151
第十七章 我国学术史上的大空位时代 ·····	160

第十八章	理学的种子与椎轮	168
第十九章	北宋理学	176
第二十章	南宋理学	188
第二十一章	明代理学	198
第二十二章	清代理学及学术前途的展望	209

第一章 诸子勃兴的因缘

近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论时代思潮有云：“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梁氏据秦以后说，故不及周秦诸子。其实，我国的学术思想，能卓然成为时代思潮，在文化史上划一时期的，当推周秦诸子、两汉及清代的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四者。佛学是从国外输入的，不能说它是我国固有的学术思想，虽然它在我国曾发生巨大的影响，欲述其大概，当别为专书。所谓“经”，和两汉与清代的经学，在《经与经学》中已撮述梗概，故本编但就周秦诸子与宋明理学叙其崖略。

所谓“子”，原是一种尊称，本以称有爵位者。例如《公羊传》宣公六年云：“子，大夫也。”《谷梁传》宣公十年释“王季子”云：“其曰子，尊之也。”故春秋时于各国卿大夫，举其溢者皆曰某子，如韩宣子、季康子等。其后，对于有道德学问者亦皆尊称之曰某子，如孔子、老子等；亦有单用一“子”字以称其师者，

如《论语》之于孔子；又有于姓氏之上再加一“子”字者，如《公羊传》中之子沈子、子北宫子之类。因此，许多学者的著述亦以“子”称，如《老子》、《庄子》、《墨子》、《孟子》之类。后来史家著录，把这些书籍括为一类，如《汉书·艺文志》则因《七略》而有诸子略，《隋书·经籍志》则承《中经》而名之曰子部。于是所谓“子”者，乃为此类书籍之专称，与经、史等相提并论了。本编所称“诸子”，即指这些学者和他们的学派书籍而言。

近来一般人称周秦诸子为“先秦诸子”。诚然，先秦时期——春秋末至战国末——是诸子之学蜂起的时候。但实际上，诸子的时代当从春秋末世起，到西汉中世止，而以魏晋时的老庄思想为其余波。在这时期中，诸子之学风起云涌，蔚为大观，说者谓比之欧洲古希腊时代，诚无愧色。为什么诸子之学勃兴于这时期呢？因为那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政治、社会、经济变动最剧烈的时期，此种变动直至西汉中世方才平静，恰好和诸子之学相终始。我国古代，至周，文化始有相当的发达，一切制度始具相当的规模，故孔子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之叹（见《论语·八佾》）。如《易》，至文王而始具（文王拘于羑里，重八卦为六十四卦，作卦辞、爻辞，见《经与经学》）；《书》，周书的篇帙也远过于虞、夏、商（《尚书》分虞、夏、商、周四部分，篇名亦见《经与经学》）；《诗》，除《商颂》及《豳风》等极少数外，皆为周代的诗歌；《礼》，则《仪礼》记礼仪，为周公所定，《周礼》记官制，最早也不会是周公以前的作品，《考工记》和《礼记》更是孔子以后的战国、秦、汉时人著述了（均见《经与经学》）；《春秋》，则是孔子笔削鲁史而成，三传更不待论。这些记录古代历史文化的经典都完成于周代，不是所谓“郁郁乎文”吗？古代的文化孕育胚胎，至周始臻相当的成熟，而这时候，政治、社会、经济以及教育和学术各方面又起了一种划时

代的剧变，于是才智之士为时代所激荡，各提出他们“改制”的主张，倡导宣传，形之著述，所谓“诸子”之学，遂呈绚烂之奇观。钱师玄同序《中国学术思想论文集要》，有云：“神州之学术思想，自羲、农、黄帝以迄东周初载，为其萌芽之时。……逮东周中叶，以生齿繁而竞争烈，交通便而知见深，腐败深而衅漏见，五帝三王之陈迹渐不足以约束当时之社会，于是聪明睿知之士，李耳、孔丘、墨翟诸人相继迭起，而学术思想之发展遂达于全盛时代。”虽仅寥寥数语，已足说明东周中世以后诸子勃兴的概况。

这时期，政治制度上有一划时代的剧变，便是由封建制变成郡县制。我国古代的封建制度，实际上是上古酋长部落的遗形与变相。那时所谓“天子”，并非如秦、汉以后的皇帝，有统治全国的实权。与其说他们是统治者，不如说他们是各部落的酋长，或封建的诸侯的领导者。夏、商、周的鼎革，不过后一代从诸侯的地位崛起，推翻了前一代世袭的天子，夺得其领导权而已，汤之于桀、武之于纣，都可作如是观。因此，易姓改代之际，虽也曾分封其功臣或子弟为新建的诸侯，大部分还是仍前代之旧；而且前一代的君主，虽已失却其对于诸侯各国的领导地位，而仍不失为诸侯之一，如舜后之陈、夏后之杞、商后之宋，至春秋时犹存。春秋之世，齐、晋、楚诸国的先后争霸，也还是为争诸国间的领导权。齐桓、晋文之流的一面争霸，一面仍表示尊重东周共主，拆穿了说，和文王在纣时为西伯，一面戡黎灭崇，一面仍“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正是同样的做法。楚国却已在实行兼并，《左传》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晋乐贞子语，见僖公二十八年），当是实录。到了春秋末年，遂仅存秦、楚、齐、韩、魏、赵、燕七雄，虽然鲁、卫、中山和东、西周等弱小国家尚间有存者。所以夷周代封建诸国为郡

县，并不自秦始，不过秦政始把强大的六国都一气并吞了，以武力造成真正全国统一的局面而已。秦祚至短，不久就又现纷扰之局，六国之后如楚、齐、韩、魏、赵等，复自立为王。汉高祖初定天下，异姓之王者也有八人，又曾分封其子弟为王。但六国之后不数年而湮灭净尽，所封异姓之王亦亡其七，至吴、楚七国反后，同姓诸王权削势禁，命官全由中央。于是封建制度根本铲除，郡县制度已造成不可动摇之局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开始于春秋中世而完成于秦，西汉初年和郡县夹杂存在的诸国，不过是封建制度的回光返照，故如昙花一现而即灭。这原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的。但是相沿已数千年的政治制度之崩溃消灭，不能不认为政治史上一种划时代的大变动。

与封建制度相终始的，为古代的贵族政治。秦以前，不但领导酋长、诸侯、号称帝王者都出身贵族，世袭传统，酋长、诸侯各有其特殊的世袭的地位，就是天子诸侯的卿、大夫、士也都世官世禄，成为贵族阶级。那时的政治权完全操在贵族阶级手中，所谓“庶人”完全不得参与政治活动。《尚书·尧典》说尧“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所谓“九族”、“百姓”，都是有地位的贵族，“于变时雍”的“黎民”方是庶人。那时候不但贵族和庶人地位悬殊，而且社会中的阶级极多、极严，故《左传》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人分十等之说（平尹无字语，见昭公七年）。这种阶级制度，在春秋之世已渐渐地开始崩溃了，故《诗》有《式微》之黎侯（《式微》为《邶风》之一篇），《左传》有降为皂隶的栾、郤、胥、原、狐、续、庆、伯诸贵族（叔向语，见昭公三年）。孔子的祖宗在宋为贵族，奔鲁以后也降而为平民（见《史记·孔子世家》）。反之，则饭牛的宁戚可以一跃而仕于齐，为奴的百里奚

可以一跃而仕于秦。降至战国，文如范雎、蔡泽等之徒步而登相位，武如孙臆、白起等之白身而取将印，更数见不鲜了。及刘邦，乃以无赖出身而破秦灭项，统一中国，开平民作天子的创局。其功臣如萧何、韩信、樊哙等，也都以平民位至将相。西汉中世，又设贤良文学、茂材异等、孝弟力田、孝廉方正诸科，由郡国选举人才，故如公孙弘等以白衣至卿相者更多。所以贵族政治和阶级社会，也随着封建制度自春秋之世开始崩溃，至西汉中世完全换了一种局面。这又是那时期社会方面一种剧烈的变动。

井田制度古代曾否实行，或仅为孟子的一种理想的经济制度，固尚待考定。但《诗·小雅·大田》已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的话，《汉书·食货志》也说商鞅始“废井田，开阡陌”，似乎古代确曾有此种制度。我国古代，黄河流域开化最早，在人稀地广的大平原上，或有实行井田制的可能。但推想那时的井田制，似乎还不能有授田均产的良好办法，孟子所说不免夹杂些托古改制的理想。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谓“彼时卿大夫世有其禄，世有其田，世居其土，世治其助耕之氓，实与今之乡里豪族相类”，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所谓“古代土地为贵族所专有，而农夫皆附田之农奴”，或庶几近之。此种“农奴”、“助耕之氓”，除平时为贵族耕田，战时为贵族作战外，政治上、经济上皆毫无地位。及井田制度废除，贵族阶级崩溃，农奴乃得解放。其在政治方面活动者，则以匹夫而至卿相；其在经济方面自由竞争而获得胜利者，乃以庶人而致巨万之富。我们只须看《史记》的《货殖列传》、《汉书》的《食货志》，便可明白。我国从上古至周，已从渔猎、畜牧进而为农业经济时代。春秋中世，商人也渐渐抬起头来了。那时候，居南北交通枢纽的郑国，似乎得风气之先。子产对韩宣

子，曾谓郑自桓公以后与商人世有盟誓，对他们不强贾、不巧夺（见《左传》昭公十六年）。而贩牛的商人弦高且能却秦存郑，在外交上建立殊勋。此后，“货殖屦中”的子贡也尝结驷连骑，与诸侯抗礼（见《史记·货殖列传》）。而吕不韦且以阳翟大贾，居公子异人为奇货而终握秦国的大权（见《史记》本传）。汉初，虽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而经济的新秩序已定，富人阶级已取秦以前的贵族阶级之地位而代之，平民也安之若素，不能再以政治的权力勉强挽回了。《汉书·食货志》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虏，犹无愠色。”这种情形，较《诗·魏风·葛屦》之以“褊心”刺所谓“好人”，《伐檀》之以“素餐”刺“不稼不穡”、“不狩不猎”的富人，《小雅·正月》之叹“哿矣富人，哀此茕独”，已截然不同了。这是随政治变动而起的经济情形的剧变。

近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把孔子、老子以前的二三百（约自周宣王二十八年至敬王二十年），当作“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并且说，参考《诗经》、《左传》、《国语》等书，那时代的情形是：

第一，这长期的战争，闹得国中的百姓死亡丧乱，流离失所，痛苦不堪。

第二，那时候诸侯互相侵略，灭国破家不计其数，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就是那些不曾消灭的阶级，也渐渐的可以相交通了。

第三，封建时代的阶级虽然渐渐消灭了，却新添了一种生计上的阶级。那时社会渐渐成了一个贫富很不平均的社会，富贵的太富贵了，贫苦的太贫苦了。

第四，那时的政治，除了几国之外，大概都是很腐败、

很黑暗的王朝的政治。

他认为这四种现象——一、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社会阶级，渐渐消灭；三、生计现象，贫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是“因”，由此发生的种种思想的反动是“果”。于是有所谓忧时派、厌世派、极天安命派、纵欲自恣派、激烈愤世派等“诗人时代”的思想，这些思想革命的种子发生出来，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时代。

胡氏所举的四种情形，战祸连年、政治黑暗在我国历史上为常见的事实，不仅春秋初世如此；贵族阶级的消灭、贫富阶级的发生，恰和我上文所述社会、阶级、经济情形的剧变相同。但此种变动，从胡氏所说孔、老以前二三百年的时代，和封建制度的崩溃平行发展，一直要到西汉中世新秩序建立后方才平靖下来，并不限于胡氏所指的二三百年的“哲学怀胎时代”。一切事物的发生，各有其“因”和“缘”。譬如种植，种子是因，土壤、阳光、水分是缘；就所谓“缘”者分别，则土壤是种子所据以发生的凭藉，而阳光、水分则是促进种子发生的力量。连年的战争，黑暗的政治，是促进诸子之学的刺激，是阳光、水分之类；封建制度、贵族阶级之崩溃，经济情形之剧变，是发生诸子之学的背景，是土壤之类，这些都只能认为诸子之学所以发生于此时期的“缘”。而其“因”、其种子，却是上古以来至周代始发达到相当程度的文化——学术思想。

有了种子，有了土壤，有了阳光和水分，植物便会自然地发生成长起来，可是还得有下种耕耘的农夫。诸子之学的发生，孔子便是那个下种耕耘的农夫。孔子以前，学在王官，学术为贵族所专有；孔子以后，学术方能普及于平民。钱玄同师序《中国学术思想论文集要》云：“此时（指东周初载以前）学术

为贵族所专有，未尝普及于平民，其握学术之关键者，实为祝、史二职。祝掌天事，如鬼神、术数诸学；史掌人事，如政治、教育诸学。学既在官，则惟畴人子弟世守其业而已。”盖古代政治宗教不分，而所谓“君”者，在能“亿宁百神而柔和万民”（用胥臣语，见《国语·晋语》），故季梁云：“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见《左传》桓公六年）师旷亦云：“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见《左传》襄公十四年）而宫之奇之谏虞公，也以“民不和，神不享”为言（见《左传》僖公五年）；刘定公之评赵孟，亦有“神怒民叛，何以能久”的话（见《左传》昭公三年）。而古人所以测知天地鬼神之旨以推断人事祸福之法，则有所谓“术数”。据《汉书·艺文志》所叙术数凡六种，一曰天文，二曰历谱，三曰五行，四曰蓍龟，五曰杂占，六曰形法。如《左传》载晋史赵、郑裨灶预知岁在鹑火，陈国必亡（见昭公八、九两年），就是所谓“天文”。蓍用以筮，龟用以卜，卜筮之事见于《左传》者更多，《尚书·洪范》也已有“女则有疑，谋及蓍龟”的话了。“杂占非一，而梦为大”（用《汉志》语），《周礼》有占梦之官，《左传》所记占梦之事也不少。“形法”则以相人之法为最著，《左传》所记有周内史叔服相人的故事，《荀子》中也有《非相》篇。至于“历谱”、“五行”，则在古代即已占重要的地位，《论语》引尧之命舜，有云“天之历数在尔躬”；《尚书·甘誓》记夏后启讨有扈氏，首责其“威侮五行”；《洪范》记箕子为武王陈治天下的大法，也历述五行之说。沟通神人的，则有巫覡与祝史。巫覡是一种民间的迷信的职业，祝史则是政府中的官职了。司马迁《报任安书》还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可见史也是和祝差不多的。史官既兼掌天人，又记历代兴亡成败的史实，故为政教未分、学在王官时的术渊学藪。老子为东周的守藏室史，孔子适周观书，

还得去和他商量哩。拙著《史官为古代最高学府》一文(见《平话周报》第八期),就是详述这种事实的。

《汉书·艺文志》论诸子,每一派都指明它所从出的一个官,其说盖本于刘歆的《七略》。他以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近人章炳麟治经宗古文,故笃信刘、班之说。胡适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则力矫之。柳翼谋《论近人治诸子学者之失》,于诸子出于王官一端,又申章而细胡。平心而论,《汉志》所说某家出于某官固未免太牵强、太着痕迹(如谓小说家出于裨官,颜师古注:“裨官,小官。”盖无从牵合,而又以小说家为小道,故漫云出于裨官耳),但也不能一笔抹杀,谓古代王官定无学术可言,即使王官有学也绝对和诸子无关。因为古代世官世业,平民无所谓学问,其欲学者不得不给事官府,为之胥徒,甚且供洒扫、为仆役。故《礼记·曲礼》说“宦学事师”(“学”字一本作“御”,即谓为其仆御。孔子以私人教授,其弟子亦尚为其仆御,如“子适卫,冉有仆”、“樊迟御”等,载在《论语》尚可考见),《周官》也说“学古入官”。《说文解字》云:“仕,学也。”仕之所以得训为学者,正因古代宦学乃能事师,学古必须入官之故。《庄子·天下》篇有云:“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百官以此相齿,……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此亦古代学在王官而史为学府之证。学术所以在官的原因有二,一因古代阶级制度极严,贵族世官,四民世业,故惟畴人子弟各以其类世传其学,且私人无著述、无教育,故非仕无由得学,无由受书。